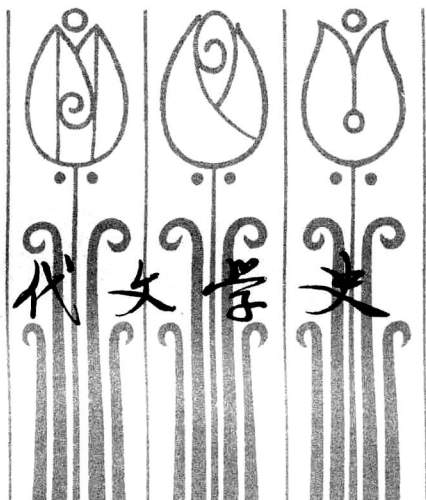


东北三省高师函授教学用书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中 册

**第二编 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1927—1937)**

第二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1927—1937)

第一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1)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和左联的成立…………… (8)

第二节 对各种反动文学派别的斗争…………… (28)

1、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28)

2、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 (37)

3、对“论语派”的斗争…………… (43)

第三节 “两个口号”的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47)

第四节 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56)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65)

第六节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 (71)

第二章 鲁迅(下)…………… (83)

第一节 后期杂文…………… (84)

第二节 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109)

第三节 诗 歌…………… (119)

第三章 茅 盾	(136)
第一节 茅盾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	(137)
第二节 《子夜》.....	(151)
第三节 《林家铺子》和《春蚕》.....	(170)
第四章 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创作	(183)
第一节 瞿秋白的文艺批评和杂文创作.....	(184)
第二节 柔石、胡也频的小说.....	(192)
第三节 殷夫的诗.....	(199)
第四节 蒲风 and 臧克家的诗.....	(205)
第五节 叶紫和肖红等的小说.....	(211)
第五章 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	(219)
第一节 巴金和他的《家》.....	(220)
第二节 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	(240)
第三节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	(254)

第一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自 学 提 要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二个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的文艺运动，是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文化革命的重要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正式提出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这部分内容要切实掌握。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提出后，曾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才明确了我国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重大的原则问题。这次讨论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增强了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为“左联”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鲁迅在“左联”成立大

会上的报告《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左联”理论和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论著。“左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团结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对各种反动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以及“论语派”等展开了斗争，粉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进攻，剥掉了他们的伪装，批判了他们的反动文艺理论。

一九三六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关于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大方向是一致的；争论取得了积极的结果，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为建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左联”时期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是有成绩的。讨论涉及到了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任务、内容、形式以及作家如何向大众学习等问题，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初步方案，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

马克思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左联”的重要贡献，它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鲁迅和瞿秋白翻译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及苏联文学作品为最多，贡献最大。

“左联”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它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论争和左联的成立

一、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文学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血腥的法西斯专政。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下，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华大学等十一校“救亡通电”中指出的“奠部以来（即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府起），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达二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等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毛泽东同志说：“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论联合政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

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的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论联合政府》）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及稍后的秋收起义和广东起义。同年十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成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并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占领了我国东北，次年一月二十八日，进攻上海，一九三五年又进一步侵占了华北，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就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抗日救亡，反而发动反革命内战。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底，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导下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的疯狂进攻。中央工农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总结这一时期的进程时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做为军事‘围

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做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的“围剿”，其残酷的程度，较之军事‘围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不但查禁书刊，封闭书店，而且还监禁和杀戮作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出版法”，一九三一年十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对“出版法”中的办法和原则，做了具体的规定，加紧对进步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品的限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凡对国民党政府有些微不满的，便是替共产党张目，一律予以严禁。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仅在上海就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禁止七十六种刊物的发行，其中有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拓荒者》、《北斗》、《文学月报》等。《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现代小说》也先后被查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被禁止出售，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对一些译本也被查禁。如高尔基、卢那卡爾斯基、斐定、法捷耶夫、绥拉斐摩维支、辛克莱的作品，甚至于象梅迪林克、梭罗古勃和斯感林培克等人的译本等也不允许出版发行。

他们还利用特务暴徒，捣毁进步的文艺团体和书店。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叙述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糊涂了。他们是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吹一声哨、停止，又吹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乱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

国民党反动派对上述一些压迫和摧残办法还嫌不够，则用监禁和杀戮，企图从根本上消灭革命文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作家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处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作家潘梓年、丁玲被捕监禁，应修人在被追捕时堕楼殒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因申报月刊登抗日言论，申报主持人史量才遭暗杀。一九三五年又因新生杂志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涉及了日本天皇，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敦睦邦交”，查封了杂志，把编辑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同年六月十八日，杀害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优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鲁迅先生也曾遭到过通缉，受尽压迫和谋害。为了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优秀的作家、革命青年，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辱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左联”为柔石、

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作家被秘密杀害发表的《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中指出：“国民党在屠杀我们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文化运动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然而这也是无效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化运动，是和劳苦群众革命运动——苏维埃政权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国民党万难消灭革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运动。我们作家的被虐杀，说明了我们的文化运动的力量已经不弱，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力量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革命作家不但没被杀绝，作家队伍反而更壮大了：革命的文学作品，不但没被禁绝，反而较前一时期大大增加。如鲁迅的后期杂文、《故事新编》，瞿秋白的杂文及文学评论；茅盾的长篇名著《子夜》及“农村三部曲”；郭沫若，田间、臧克家、艾青的诗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名剧《雷雨》、《日出》和洪深、夏衍的剧作，以及三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新文体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夏衍的《包身工》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主要的作家及作品，几乎都产生在这十年中。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就曾经做过正确的论断：“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以腐烂到所谓的‘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产生，现在来抵制左翼文

艺的，只有诬辱，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左联的十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大发展的十年，文学创作繁荣的十年，也是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对左联时期的文艺运动曾作出很高的评价，他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从中隔断了的原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对左联时期文艺运动的正确的总结。

二、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

革命文学的口号，在一九二三年，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就提出来了。一九二六年在《革命与文学》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并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也发表了《革命文学与它的永久性》，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原因是大家正忙于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到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八年，之所以再度被提出来，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追述的：“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里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

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地，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这种“强烈的活动”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党在新形势下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它表明了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在大革命中受到了革命锻炼，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从蒋介石的叛变中激起了的愤怒从而有了初步的觉醒，“终于发现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①由于革命的发展，进步的文学工作者思想认识起了变化，因之，他们自觉地站到劳动人民方面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促使文学运动也有了深入的发展。这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提高，使文学适应新的历史阶段的革命形势，成为革命的文学工作者普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文学”口号再度被提出，而且立即广泛地展开了讨论。

倡导“革命文学”最努力的，在1928年是“创造社”和“太阳社”。

五卅运动后，“创造社”逐渐趋向革命，其中，郭沫若、成仿吾还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回到上海从事文学运动。这时，又增加了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这些共产党员在日本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热心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创

① 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

造社”出版的刊物除1925年创刊的《创造月刊》和《洪水》仍继续发行外，又新出版了《文化批判》，开始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些宣传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便陆续出现在这些刊物上。

“太阳社”的主要人物蒋光慈、钱杏邨等人，于1928年1月创刊了《太阳月刊》。蒋光慈的一些阐述革命文学理论的文章如《关于革命文学》等，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上的。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当时还有党的基层组织。这两个文艺团体都集中力量倡导“革命文学”，不同程度地贯彻党的意图。因此，“革命文学”的宣传在新文学界就形成很大的声势。

在“革命文学”的讨论中，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李初梨、克兴、彭康等人，都发表了很多文章。归纳起来，有下列几个要点：

第一，关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确认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是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的文学应该服从革命的政治和革命的要求。冯乃超说：

“人们依然生活在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及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①

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前的革命斗争就给革命文学带来了历史使命，文学必须服务于革命斗争。蒋光慈说：

“我们国内有残余的军阀，有残酷的、愚蠢的封建资产

① 冯乃超：《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阶级，有被剥削到极点的劳苦群众，国外有专门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而这个帝国主义又与我们的旧势力连合一起，共同压迫我们革命的力量，同时我们革命的力量就不得不在这种两重压迫下剧烈的攻击。”①

这就肯定了革命文学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但是，怎样实现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的呢？在这方面，他们主张“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文学应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李初梨说：

“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②

他们肯定了文学的广义的宣传工具作用，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空谈。冯乃超说：

“一切的艺术，本质的必然是‘煽动’‘宣传’（这不拘艺术家自身有意或无意）。中国的旧作家，不论他是意识的无意识的，以‘上京求名’的事实写脚本，这作品是官吏阶级的‘升官发财’思想的宣传，这是客观的、从批评家的主观独立的事实。这样，中国旧戏替以前社会的支配阶级尽了许多义务；然而社会已渐次变化，新戏要把旧戏的责任取来负担”③。

第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他们认为革命文学作者，应该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创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促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

①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

②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③冯乃超：《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仿吾说：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级（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的我们，也已经曳着跛脚开始了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我们的文学运动（全解放运动的一个分野）却还睁着双眼，在青天白日里寻找已经迷离的残梦。

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服赫变’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创造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

我们如果不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根迫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①

怎样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以及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呢？他们提出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甚至提出去掉外国的坏影响，克服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向那**醒醒的工农大众**”走去。

第三，关于革命文学的对象和形式问题。他们认为革命文学的对象是工农大众。成仿吾说：“我们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②。因此，在革命文学的形式方面，他们认为革命文学的形式一定要浅显通俗，能为工农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成仿吾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③克兴说得更为清楚，他说：

“据我看，以后革命文艺是应该推广到工农群众去；那末，文句应该通俗化，应该反映工农的意识。”④

①②③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④克兴：《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

再后一些时候，郭沫若甚至提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指大众文艺）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普罗列塔利亚大众。始终要把‘大众’两个字刻在你的头上”的主张。为什么要这样呢？冯乃超说：

“文学战线如果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那末，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文学深入大众的问题。”①

显然，他们都主张革命文学应服务于工农大众，语言及表现形式力求浅显通俗，能被工农大众所理解所接受。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以无产阶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原则，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提倡“革命文学”，比较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和进一步地发展了革命文学理论，是具有非常重大的进步意义的。它引起了文坛上对革命文学的重视与讨论，结果把1923年以来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许多零散的主张理论化、系统化，把中国新文学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次讨论的重要收益是使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几个原则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阐述，肯定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文学是为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新文学具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地、更好地为工农大众为革命服务。尤其是他们提出的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要把小资产阶级“否定一遍”，这就进一步提出了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已经朦胧地见到了作家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学观。

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理解得不够深

①冯乃超：《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